

红色往事

红墙 见证录 二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著



“大跃进”与“大饥荒”
毛泽东与中印边界之战
庐山会议，历史的插曲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
国民党战犯的特赦
政治风暴吹倒的元帅与大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当代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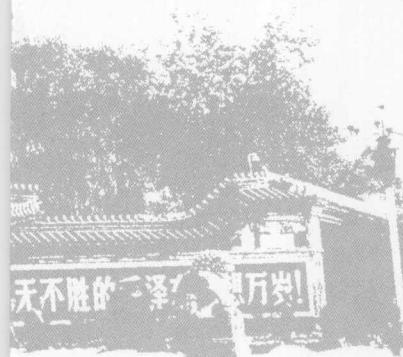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红色往事

红墙 见证录 二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尹家民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0（2009.11重印）
ISBN 978-7-80170-860-1

I. 红… II. 尹…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1958~1976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8219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德仁
责任编辑 何琳
责任校对 郭雪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张 19.5 印张 插图 20 幅 292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前 言

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隆隆，到“大跃进”的热浪滚滚；从庐山的风云激荡，到“文革”的历史失误；从林彪结党营私、红极天下，到折戟沉沙、面目全非；从江青一伙风光无限，到“四人帮”被人民审判；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人物及彭德怀、陈毅、贺龙、陈赓、刘亚楼、耿飚、黄镇等众多将领，在共和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忽如一夜，风暴席卷，恶人当道，威猛一世的将帅们饱尝了酸咸苦辣，足智多谋的外交家们一时难辨东西，黑白颠倒，神州蒙冤……好在历史是人民写就的，最终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

你既可能为一代革命精英的言行拍案叫绝，也可能为历史的错轨而喟然长叹，更会为共和国的光明前途而振奋。打开长卷，每一件大事的来龙去脉，每一组人物的对抗或合作都给你以新的启示；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领袖人物超凡脱俗的智慧和人格力量，也流露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和难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共和国领袖群体。平心而论，谁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人不是神，为此我们并不苛求他们的得失，只是尽量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而使我们这个民族中薄弱的一环坚固起来，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共和国昨日的风雨历程，是由一系列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创造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呕心沥血，上下求索，无疑是大浪漩涡的中心。前进与曲折，光荣与梦想，几度大悲大喜，多少是非曲直，构成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千古诗章。一代风流人物已经故去，新的领袖展示政坛。经验也罢，教训也罢，血也罢，泪也罢，这厚重的共和国历史，不管你是否亲身经历过，或者听说过，都是一部难以复制的人生宝鉴。后人只有深深地记住它，才会珍惜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才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全新的人生……

目 录

第一章 冒进之争 / 1

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 2

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出现分歧 / 5

周恩来仍在努力反冒进 / 9

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问总理：你写得出来吗？ / 11

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 19

第二章 毛泽东与中印边界之战 / 25

毛泽东回首战事，不禁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

张国华怎么也脱不下毛裤，腿肿得根本脱不下来。他喃喃说道：“我已经4个月没脱衣服上床了……”

面对赫鲁晓夫的偏袒，毛泽东表情严肃 / 26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 28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 31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 32

将军们面临非同战争的风暴 / 34

毛泽东伤感：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 35

第三章 庐山：历史的插曲 / 37

贺子珍说道：“我看他（毛主席）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

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

庐山会议前，平静中的不平静 / 38

毛泽东秘会贺子珍 / 43

毛泽东想解决“头脑发昏”的问题 / 46

形势所迫，许多人提高了调门 / 50

常委会上，彭德怀难以申辩 / 53

庐山的悲剧风光 / 54

彭德怀给毛泽东最后的上书 / 59

第四章 “大跃进”与“大饥荒” / 67

连续工作了 17 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拨拉着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

在毛泽东吸烟的烟雾中，车厢里的空气更加凝重，人们不免为江渭清担心起来。

领袖们为粮食问题焦虑 / 68

因农村食堂的事，两个老乡非要见毛泽东 / 73

毛泽东希望下去的人多来信 / 78

周恩来“赌酒”：干三杯，增加外调粮三亿斤 / 82

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 86

第五章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 / 93

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不可能是“水下攻击”。

周恩来颇有些激动地说：“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震动世界的新闻 / 94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 95

改由陶勇当指挥 / 98

周恩来关照着每一个细节 / 101

发现了沉船礁岩 / 104

终于揭开“跃进”号沉没之谜 / 107

第六章 功德林阳光 / 111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

“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特赦”的酝酿过程 / 112

再生之狱 / 115

会见：从国事到家事 / 118

杜聿明的特殊感受 / 123

第七章 政治风暴吹倒的第一位大将 / 127

罗瑞卿无论对毛泽东或是对林彪从无二心，那么为何招致林彪的如此痛恨呢？

罗瑞卿是个自觉又细致的人，他要秘书将自己的手枪、猎枪以及下属们的枪都交上去。

林彪与罗瑞卿曾同台演《庐山雪》 / 128

林彪由“大比武”开始倒罗 / 130

林彪将罗瑞卿打入十八层地狱 / 137

“彭罗陆杨”被捆绑在一起打倒 / 142

上海会议成为批罗会议 / 144

倔强的罗瑞卿选择了“毁灭” / 149

“彭罗陆杨”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 154

罗瑞卿残腿难治 / 155

叶群一伙接到了罗瑞卿提出要截肢的报告 / 159

第八章 林彪为何视陈毅为眼中钉？ / 165

朱德、陈毅对林彪印象不是太好，所以尽管他是黄埔四期生，打仗也勇敢灵活，但都没有提升他。

陈毅猛一仰脖，将一杯酒倒进肚里，把空杯子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陈毅曾立志“文艺救国” / 166

陈毅曾保护过早期的林彪 / 168

一次特殊的家宴，陈毅发泄着对林彪等人的不满 / 173

五元帅碰头会上慷慨陈辞 / 176

林彪一伙在暗中整陈毅 / 180

第九章 “政治元帅”的人生准则 / 187

罗荣桓看上去不像个战将，是因为他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



近视镜。人们有时爱称他为“政治元帅”。

除了吃黄豆就是吃中药。林彪自己看医书，亲自开药方，秘书或警卫按方抓药，煎好就拿给林彪喝。

从罗荣桓的处事为人说起 / 188

“林罗”共事多年，罗荣桓从不贪功诿过 / 192

辽沈战役中的分歧并没影响“林罗”的关系 / 196

“林罗”志不同道亦不同，冲突渐起 / 205

林彪发誓：“林罗要分开！” / 208

第十章 岂止是“龙”“虎”之争 / 213

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贺龙的前半生总的来说是走运的 / 214

林彪整贺龙，被一些人称作“龙虎斗” / 217

林彪把“兵变”的吓人帽子扣到贺龙头上 / 225

贺龙“问题”逐渐升级 / 230

赫赫元帅竟连水也难喝上一口 / 234

历史终于为贺龙平反 / 237

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的政治投靠 / 241

1960年，黄永胜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是歌颂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文章情真意切。

项辉芳帮助“老虎”相亲。她凭着黄永胜的地位，动员了广州军区的大批力量……

上将黄永胜，战功赫赫，污点明显 / 242

曾对老领导罗荣桓感恩戴德 / 243

政治投靠与感情投资 / 248

诬陷迫害成了一种职业病 / 250

第十二章 空军司令如何成了“空”军司令 / 253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股揭发、批判吴法宪的潮流猛然而来，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感到地位不稳，特别是林彪保持沉默，更使吴法宪忐忑不安。

吴法宪：“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

林彪以“实权”作诱饵，吴法宪本色丢尽 / 254

为林彪加害罗瑞卿开具“罪证” / 256

刘亚楼到底有没有“四条遗言”？ / 260

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出笼与收场 / 265

第十三章 海军政委与司令的“陆上对抗” / 273

叶群给李作鹏起了个雅号：“李瞎子”。其实这只报废的右眼是
有功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作鹏、王宏坤等说：“萧劲光是老
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

墨镜后面的光荣历史 / 274

李作鹏检查海军与“林总”不一致的地方 / 275

矛头对准海军司令萧劲光 / 278

林彪亲自出面保李、张 / 283

第十四章 总后勤部长成了林家的“总管” / 287

毛泽东在傅连暲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
予保护。”

趁着看管人员放松之机，邱会作在纸片上写信给叶群，发出了
紧急呼救信号——“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
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战功卓著，得中将军衔 / 288

与林彪结党，是从“罗瑞卿事件”开始的 / 289

除掉傅连暲，为林彪再立新功 / 290

林彪为邱会作救了火 / 295

“五一三事件”中的派别之争 / 299

第一章

冒进之争

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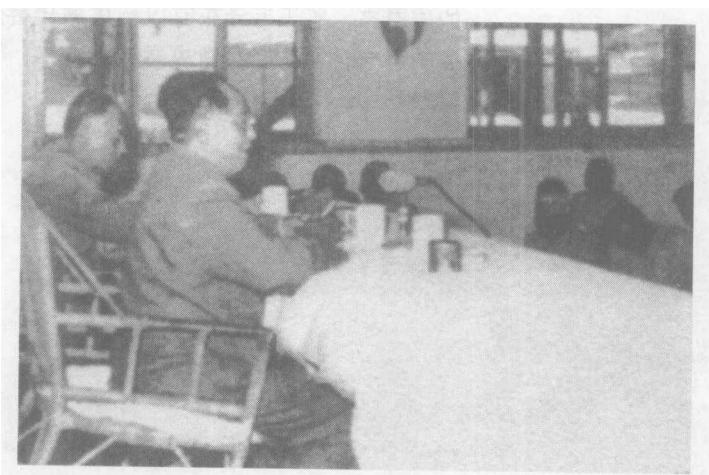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做过这样的描绘：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的7月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藤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藤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详见《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山西人来啦！”陶鲁笳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笳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笳示意：

“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笳摆摆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夹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笳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时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笳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笳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土地、劳力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是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笳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笳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



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逄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 90 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 104 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赘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 1956 年 1 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1949 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5 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 年 11 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茏。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 42 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 800 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见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 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 14 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 1967 年粮食产量达到 1 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 1956 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

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5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

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出现分歧

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火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毛泽东眼前是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



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吴冷西：《忆毛主席》）

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他还念了一副对联，借以表达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恩来和薄一波谈话时，总结出“多”、“快”、“好”三字，毛泽东觉得好，以后就提出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的说法，李富春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这就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

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 1956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 1956 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也是心急如火。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颇有同感，他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推进，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956 年 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2 月 8 日）的近一周后，2 月 14 日，毛泽东在 34 个部委汇报工作时，不时有些插话，仍然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穷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不能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渐渐地，周恩来与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从防止冒进走向了反对冒进。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 1956 年 1 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1 月 20 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 月 30 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为了预算指标的问题，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毛泽东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周恩来发言最多：“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虽然周恩来依然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在毛泽东听来却相当刺耳，难以接受。尽管他一向乐观地看待孤立，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的陷入孤立，其思考多时的远大目标得不到响应时，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的建议仍然得不到委员们的支持时，他宣布散会。大家不快而散。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讲辩证，也讲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更多的是大刀阔斧，有重点论强于两点论；他不喜欢两只拳头同时出击，当两只拳头同时出击时，他总觉得是一个拳头掩盖了另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个拳头扰乱了另一个拳头，而使出击者本身莫衷一是，所以他喜欢“一个拳头打人”，为了更有力哪怕先缩回拳头，但决不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所以毛泽东的讲话中，不常说“既要又要”什么；或“一手”什么“另一手”什么，而喜欢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东风压倒西风”；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

然而经济的许多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的正是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的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周恩来讲话均来自1988年2月《党的文献》：《周恩来反冒进文献五篇》，并参考同期所载熊华源的文章：《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中央开预算会议时，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